

李
洱 著

午后的诗学

李洱作品系列·中篇小说集

李洱作品系列·中篇小说集

李洱著

午后的诗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后的诗学/李洱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21-4582-9

I ①午…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4654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丁元昌

统 筹: 郝 理

责任编辑: 李 霞 方 铁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午后的诗学

李 洱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67 000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9/I • 3567 定价: 25.00 元

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自序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 洱

2012年9月27日

目 次

自序	1
午后的诗学	1
遗忘	61
动静	139
光与影	170

午后的诗学

事隔多年,有一天,我和费边谈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时,我们的回忆竟然大相径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八十年代末,地点是济水河过的小广场。那天的中午,我正和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广场那边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叫声。她拉了我一下,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去那边听听诗朗诵吧。”那天参加朗诵的人很多,每个朗诵者都得到了足够的掌声和鲜花。费边那天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一首描述罪愆、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高贵的诗篇。那大概是那天朗诵的唯一的一首真正的诗篇。费边从那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下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拦住了他。“我们最喜欢你念的最后几句,够劲、解气。”他们重复了他们认为“够劲”、“解气”的那几句,意在表达他们是他的忠实听众。有趣的是,他们记错了,他们七嘴八舌重复的“诗句”,要么是费边前面的那个人喊的口号,要么是等不及费边下来就跳到台子上去的那个末流诗人吐出来的打油诗。费边听他们讲完,脸上浮出了笑意,随即甩出一个警句:“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在这之前,我已经听说费边是这座城市杰出的诗人,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是

一个诗歌爱好者。她将一瓶酸奶递给费边,说:“我也喜欢马拉美,不过我喜欢的是他的另一首诗,《纯洁,生动》。”费边咬着吸管的嘴巴松开了。他看着她,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你说得真好。爱诗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生动的诗。”这时候,掌声和喊叫声又响了起来,将他的声音淹没了,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却听不清他又有哪些高论。

这一天,我们三个人在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聊了十分钟左右。我记得他很匆忙,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得先走一步。临走,他给我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有空儿,请过来说说话。”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对我身边的那个女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喜欢和一流的女人讨论问题,读二流的诗思考问题,写三流的诗表达问题。”他的口才真好啊。说这话的时候,他用食指推了推眼镜。那是一副茶色玻璃眼镜(这副眼镜我后来没有再见过)。他的鼻梁有点高,镜架搭上去,就像骑士双腿岔开坐在马背上一样。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

费边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九十年代认识的,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的客厅。他说:“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并且像你所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那我肯定会记住你,”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过目不忘是我的强项。”他说,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作品,而是但丁的《神曲》。他说,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因为他朗诵完之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算下来的,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这当然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

不过,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这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初,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到出发的时候,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那一天,我们漫山遍野地跑,跑得脚底起泡,也没能见到猎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回城,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因为距离远,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接着,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和微冲一起借来的),幸亏费边没有把脸贴着枪托去瞄准,否则,我们(尤其是费边)非被打坏不可。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神来。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这才把心放宽。“我们和死神亲吻了一下。”费边说。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的感觉,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我们搂到了一起。费边说:“挺有意思,猎物没有打着,自己却差点报销。”我说,这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费边用脚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兔枪,说:“要是写到它,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起码得让他瞎一只眼。”接下来,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他的话说得精彩,应该记下来: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我后来多有领教。他并不要贫嘴。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的地点,总是发生奇妙的吻

合,在性行为和 V-2 火箭之间,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当然,差别还是有的。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他既是 V-2 火箭,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

认真回想起来,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知道我的名字的,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他大概认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

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漂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这些知识界的朋友,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构思好了。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他是费边的朋友,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时候,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提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墓志铭意识”。“用不着提醒,这玩意大家都有。”有人立即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这个人怕远来的客人不信,就建议大家都把墓志铭写下来,互相传看一下。他的建议荒唐而有趣,大部分人都抵着膝盖写了,并交到了他的手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是我和费边的。之所以能记住费边的,是因为我后来又听他说过几次。那其实是但丁《神曲》里的两句诗:时间就在这只器皿里有它的根,而在其余的器皿里有它的枝叶。这一天,在随后的发言中,费

边对《天堂篇》中的这两句诗还作了一番解释。就我所知,他后来将这则墓志铭藏到了书架上的一只彩陶里,那是它的一个好去处,因为在费边看来,出土的彩陶就是在时间中扎根的器皿。在一首诗中,费边写道:

空洞的彩陶是满的
它装满了时间
土黄色的纹饰是绿的
时间是它的枝叶

什么都谈,什么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聚会上研讨一番。有一段时间,一些搞经济和神学研究的人也加入了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人多了,一般的客厅也就盛不下了,于是大家就移师室外。西郊的一个废弃的兵工厂,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移步换形,走出封闭的房间来到四周都是原野的大院子里,一些新的话题也就进入了交谈。关于农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田园和城市的二元对立,人们都谈得唾液乱飞。但待在郊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遇到刮风下雨,事先定好的日期就得变动;一些老弱病残者,骑车跑那么远,每次都累得半死。好在这个时候,一些凑热闹的人已经很少来了,剩下的人,较大的客厅已经装得下了。费边的朋友和同事,一个名叫韩明的人,提出聚会可以放到费边的客厅里搞。他的提议正中费边的下怀,费边早就想为朋友们多出点力了。费边对大家说,他是个单身汉,母亲住在姐姐家里,自己的住房很宽敞,他完全有能力干好后勤工作。他还表示,他要马上找民工,把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打掉,让客厅更敞亮一些。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最后的那几次聚会确实是在费边的客厅里搞的，费边的后勤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费边后来对我说：“你看，我摇身一变，就成了边缘的中心，算下来，那可要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啊。”

费边的房子位于这座城市的黄金地段，濒临济水河。虽然济水河是一条鱼虾早已死绝的臭河，但它毕竟是自然的象征。黝亮的河水流动时，形成的小小波浪，和碧海中的波浪仍然具有同一性。就像上海的情侣们喜欢挤到臭烘烘的外滩约会一样，这座城市里的人也常到这里转悠，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风景胜地。作为这里的长期住户，费边谈起济水河的时候，常常没有多少好话。我们刚移师到费边那里的时候，济水河边正是一副锣鼓喧天、旗帜招展的景象。被组织起来的人们，正在那里疏浚河道，用水泥和石板铺设河床。他们伐掉高大的悬铃木，扩展广场，修建舞榭亭台。这些东西都成了费边的话柄：这是世纪末最杰出的行为艺术：死马当活马医，臭椿当香椿吃。广场是权力的象征，众多的小广场是大广场无数的繁殖。而那些舞榭亭台，只不过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乖乖地逃避真实的命运。费边对朋友们说，看啊，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费边的朋友韩明说，自己以前就常来这里看戏，有时看得津津有味，恨不得在这里住下不走。

我们在那里谈亚里士多德，谈米沃什，谈布罗茨基，谈学生们送给阿多诺教授的两样礼品：粪便和玫瑰。布罗茨基的那两句话（我是二流时代的二流诗人，二流时代的叛臣逆子）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费边有一次提到了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的逸事，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这位有趣的皇帝，在代表着新文明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不事抵抗，只在那里逗弄小鸡。“他是一个对罪恶心中有

数并能作出艰难选择的人，”费边说，“在缴械的时候，他盯着那些刚爬出蛋壳的小鸡，心中充满喜悦、寂寞和自由。”费边总能找到这种逸出历史编年史的“本质性”事件，使大家在严肃的讨论中，放松一下神经。有一次，韩明和一个写《论语新注》的人吵了起来。那人事先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新注带来，供大家讨论，可临到出门的时候，却要求派车去接他，韩明是聚会召集人之一，他只好坐出租车去把他接了过来。韩明发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烧得厉害，头昏脑涨”，在讨论中就专和他抬杠。如果不是因为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这两个胖子就要像相扑选手那样扭到一起了。费边并不上去拉架，他有办法制止他们。他向别的人提起了一个梦，世上最有名的脱星麦当娜做的一个春梦。在梦中，麦当娜和罗慕洛斯大帝的现代传人戈尔巴乔夫做爱，在高潮上下不来。“赖莎在旁边吗？”有人问。费边说：“你们可以去问韩明，他知道得比我清楚。”韩明说，他是从录像带上看。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下次再看的时候，一定会格外留意。韩明顾不上和那个人吵了，他现在忙着给朋友们解释他看到的精彩镜头，并提议大家来讨论讨论那个有趣的梦。话题至此转换了。“世俗欲望”、“大众传媒”与“集体迷幻”、“性的深层本质”，这些词语立即从舌面上跳了出来，蹦上了桌面。就像一群猫见到了被夹住的一只老鼠，每个人的声音，都那么有力、那么欢快。刚才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最后那两次聚会，这些精英们讨论的是怎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他们决定先办一份杂志。既然已经到了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那就有必要把每个人的思想都收割一下，存到谷仓（杂志）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操作”的词，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上流行开了，大家都说，这事要好好操作一下，首先得起一个能叫得响的刊

名,然后制定一个有弹性的编辑方针。为了更好更快地把杂志搞出来,有人建议可以请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编辑来一起讨论。这个请人的任务就落到了交际多、门路广的韩明头上。“你可别又领来一堆女人,”一个研究西马的人对韩明说,“这是正事,不能瞎闹。”

好像专门要和那人抬杠似的,韩明那天领来的又是个女人。韩明显然料到别人会偷偷质问他。因此,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先把那个女人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他说,她曾是一个校园歌手,因为男朋友死了,就主动退学了。所有与死亡有关的爱情故事,在九十年代,都带有神话的气息,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不信,你看每个人的眼神都很肃穆,包括那个反神话论者。这是费边后来向我转述的他当时的分析和观察。韩明那套话还真是管用,大家都饶了他。那个女孩在韩明说话的时候,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穿着一套印有许多暗红色方格的裙子,像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留着齐耳的短发。和韩明的解释相配套,她也显得很悲戚,脸色有如晨霜。如果不是事先规定好了议题,我想,那次聚会的主题就变成爱情和死亡了。

开始给梦想中的杂志起名字了。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有许多好名字、怪名字。起名字是有学问者的强项,可以充分显示大家的视阈、才学是怎样的广漠和不同凡响,大家的脑子转得有多快。每个人露了一手,有人建议叫《远东评论》,有人建议叫《日常生活》。反对这两种命名的人,说刊物不妨就叫做《反对》或《命名》。《反对》也遭到了反对,提出反对的是一个小说家,他建议用与刊物毫不相干的事物来给刊物命名,比如可以命名为《企鹅》。有人提出可以叫《蛋黄》,有人顺着“蛋黄”的思路往下走,说可以叫《变

蛋》……提出来的名字，足足记满了 64 开本那么大的一张稿纸。作记录的是费边，他用的不是钢笔，而是新买的圆珠笔，以免抒写工具发生缺水一类的故障。在记录的时候，费边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分析、联想、臧否、推敲。“既然可以有各种命名，那就说明它其实无法命名，干脆就叫《无法命名》得了。”他插了一句。在所有的名字当中，我就觉得《蛋黄》比较有意思。蛋黄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由蛋黄可以想到鸡蛋。任何事物都可以比作一只椭圆形的鸡蛋，它有两个确定不移的焦点。这是个致命的隐喻：一个焦点可以看成是我们占有的事实本身，另一个可以看成是我们对占有的事实的批判。这两个焦点隐藏在脆弱的蛋壳之内，悄悄发力，使你难以把它握碎。每一种命名都被由才学和视野编织的筛子过了一遍。到后来，筛子上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龟兔赛跑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乌龟跑出去之后，兔子们说，别急，哥儿们，咱们先在一起分析一下哪个跑道比较合适，速度怎样分配，哪个老兄带头冲刺。最要紧的是，哥儿们得先给跑步的姿势起个像样而且中肯的名字，使它有名有实。费边的分析和联想被人打断了，大家需要他这个东家也说上几句。因为他正在那里分析，所以他就脱口而出：“既然大家都在分析，那就叫《分析》算了。”这么说的时侯，他的脑子已经活跃起来了，语言和思维同步，他对随口说出的《分析》这个名字作了一番分析。“这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他说，“所有人都在分析，什么都得分析。教师在分析学生，学生在分析校长；病人在分析医生，医生在分析医院；丈夫在分析妻子，妻子在分析情夫；人在分析枪，枪在分析人；人对灵魂作出分析，灵魂对人作出分析；天堂在分析地狱，地狱在分析天堂……”他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分析”这个词就像串糖葫芦的竹签，把许多毫不相干的事物都

串到了一起,然后成群结队地从他的喉咙跑了出来。他说:“学生们在五月风暴中送给阿多诺教授的那两样东西也值得分析。粪便在分析玫瑰,玫瑰在分析粪便。”

“哦,粪便和玫瑰。”费边把这两个词又重复了一遍,既像是在重复诗中的一对孪生意象,又像是在强调他突然想起来的某对诗学概念。他一边说着,一边做着往下砍的手势。那手势并不生硬,带有抑扬顿挫的意味。说完这番话,他刚好走到韩明带来的那个女孩子跟前。那个女孩子现在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仰着脸看他。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戚,有的是崇敬和迷惘,有如午后的向日葵。他的脑子现在正灵着呢,仿佛受一种惯性驱使,他又顺便对她的迷惘作了一番分析:她迷惘是因为她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与她的不幸疏离了。迷惘是记忆和遗忘的交错地带,是忠诚和背叛杂交的花朵。这一番话他并没有当场说出来,他想,他应该另外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聊聊她的迷惘。他这会儿只是弯下腰,向她表示了一下他对她的迷惘的关切。当然,他没有指出她的迷惘,他用的词是“不适应”:“你是不是有点不适应?来多了,也就习惯了。”女孩没说话。她看了看韩明,又看了看费边,然后浅浅一笑,算是对他的关切的回报。

费边这套精彩的发言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当然,所有人的话都等于白说了。为了不耽误议程,大家先把命名的事悬置了起来,开始讨论编辑方针和编委会的设置。方针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那就先讨论编委问题吧。有人说,这事也没有必要啰嗦,轮流坐庄就行了,要不就抓阄。这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说这话时,人们口气轻松,表情俏皮。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其实已对

这份杂志不抱什么希望了。它还没有开花,就已经要凋谢了,果实只在人们的梦中漫游。有一个翻译家,刚才钻在厕所里,没有听清人们的议论,他出来之后,提议大家为刊物集资,并率先捐出了几张大团结(钞票)。别的人也只好去掏口袋。这样一来,一些钢镚就在地上滚来滚去,互相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费边跑进书房拿出了一只彩陶,将钢镚收到了一起。他对朋友们说:“我可以拿出一笔钱,先把第一期印出来。”说这话的费边,颇有点舍我其谁的味道。人们都愣了,愣了一会儿,才像鸭子那样齐刷刷地扭过头,去看拎着彩陶站在客厅一角的费边。就在人们这样看他的时候,那个由韩明引来的女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将蹲在地上捡起来的一把硬币,丢进了彩陶壶。

几年之后,当一切都已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当各种戏剧性情景成为日常生活的写真集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的婚宴上,我看着费边,又想起了杜莉往他的彩陶壶里丢钢镚的事儿。费边那天喝得不多,他一直在讲话。刚和新婚夫妇开过玩笑的费边,现在又给同桌的一对恋人讲起了柏拉图的“爱情说”。“柏拉图?不就是那个提倡意淫似的精神恋爱的人吗?”那个男的一边剥虾仁一边说。费边摇摇头,说:“朋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柏拉图‘爱情说’的核心恰恰是和受伤的肉体有关的。”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了。果然,他又讲到了蚯蚓、人和上帝。他说:“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最早的人就像蚯蚓,是雌雄同体的,后来,上帝从上到下把它劈成两半。人有多高,那伤口就有多长。人必须到处跑,寻找正在别处漫游的另一半,使那伤口愈合。来啊,让我为你们成功的漫游干杯。”那一对恋人爽快地把杯中的酒干掉